



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 石刻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福建华安仙字潭 摩崖石刻研究

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0年·北京

2711/04

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

FUJIAN HUAAN XIANZITAN MOYA
SHIKE YANUO

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2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0.3125 印张220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统一书号: ISBN 7-81001-196-0/K·31 定价: 4.10元

目 录

仙字潭岩刻研究的可喜进展(代序)·····	吴玉贤 (1)
汰溪古文·····	黄仲琴 (11)
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的调查·····	林 钊、曾 凡 (17)
福建古代闽族的摩崖文字·····	弘 礼 (22)
论广西岩壁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	石钟健 (28)
福建华安汰溪摩崖图象文字初研·····	刘蕙孙 (45)
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试考·····	林蔚文 (61)
漳州华安汰溪摩崖石刻与高山族·····	陈国强 (79)
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性质浅议·····	曹锦炎 (87)
《西山杂志》记汰溪摩崖石刻的 几个问题·····	陈国强 (91)
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再探·····	林蔚文 (103)
仙字潭石刻性质探讨·····	徐 明 (114)
仙字潭摩崖石刻散考·····	黄超云 (120)
仙字潭摩崖石刻的族属、年代和内容·····	万里云 (135)
汰溪摩崖石刻年代初议·····	陈存洗 (147)
华安岩刻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岩画·····	陈兆复 (155)
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	盖山林 (163)
对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的几点看法·····	蒋炳钊 (175)
华安仙字潭石刻符议·····	狄宠德 (187)
仙字潭岩刻图像性质内容浅析·····	蒋振明 (200)

华安仙字潭摩崖的考古学观察·····	陈 龙 (218)
略论华安仙字潭岩刻研究·····	王振镛 (227)
福建仙字潭摩崖石刻初议·····	曾五岳 (239)
仙字潭与仙人峰岩刻新探·····	樊万春 (244)
仙字潭岩刻性质浅议·····	余闻荣 (253)
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性质考辨·····	盖山林 (258)
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若干问题续探·····	林蔚文 (277)
福建华安县仙字潭石刻·····	林 涛 (290)
漳州岩画·····	盖山林、曾五岳、林 涛 (293)
唐代南安县界题字刻石·····	陈 敬 (313)
附图照·····	(318)
后记·····	(326)

仙字潭岩刻研究的可喜进展

(代 序)

吴玉贤

在陈国强教授等许多专家的倡议推动下,《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仙字潭岩刻自发现以来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论文集,书中收录了我国学者五十多年来有关仙字潭岩刻研究的论文及拓片原始资料三十篇二十万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仙字潭岩刻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水平。它既是对仙字潭岩刻研究成果的科学总结,也为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它的出版是岩刻研究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有关方面约我写序,实在是勉为其难。为学术著作写序,本是名人大家的事,笔者才疏学浅,接触岩刻还只处于“人之初”阶段,在众多的前辈和专家面前,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但由于对仙字潭岩刻的热爱和兴趣,也由于如此丰富精辟的研究成果所引起的阵阵激动,使我不揣简陋,作为后学者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来发表几点意见。

仙字潭岩刻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以北三十公里,华安县汰内乡苦田自然村附近的九龙江支流汰溪边的崖壁上,此地清溪蜿蜒,峰峦起伏,江阴临水的悬崖上峭壁屏立,上面刻着

多组风格相近、技法类似的纹样。这些纹样古怪苍老，似字又有别于传统观念上的汉字，似画又过于抽象变形，加上年代久远，风吹日曝、苔披藤挂，部分纹样漫漶不清，故后人竟无人能辨。据目前资料，历史上最早试图对仙字潭岩刻进行释读者当推唐代大文豪韩愈。当时，“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请韩愈辨认，韩愈“见而识之”，释读其文曰：“诏□黑视之鲤鱼天公界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韩愈堪称探索仙字潭岩刻内容方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惜关于韩愈释读的事再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不知其释所据何在，后来无人提出质疑，当然也未引起争论。这样，一方面韩愈的释读作为唯一权威的观点，被历代文献所记所传，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无人提出更权威的观点，从而使研究工作没能取得进展并在客观上遭受窒息。另一方面，由于岩刻纹样本身的怪异，古文献的渲染，加上仙字潭远离通都大邑，潭深林密，悬崖陡峭，人迹罕至，岩刻被人为地秘化，久而久之、“人莫能识”，遂有“仙字”、“仙篆”、“天书”、“雷劈显字”等种种不科学的说法。毋庸置疑，古文献记载对于仙字潭岩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少的作用，但仅仅停留在这上面则是远远不够的，这也许是一千多年间仙字潭岩刻研究之所以无法突破的原因。

真正对仙字潭岩刻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考古科学的研究是近现代的事，这个研究过程大体上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有筌路蓝缕之功。1915年8月，黄先生不避风险，深入到当时还是荆棘丛生的仙字潭进行实地调查，1935年又将其调查情况和研究论文《泐溪古文》在

《岭南大学学报》四卷二期上发表，开仙字潭岩刻研究的先河。黄先生不仅是近代对仙字潭岩刻进行实地考察的第一个考察者，也是发表有关研究成果的第一个研究者，功不可没，至今为学术界所称道；在第二阶段，福建省文管会林钊、曾凡先生有承前启后之劳。1957年8月，为了了解仙字潭岩刻的现状，林、曾二先生到仙字潭进行考古调查，事后，即将调查报告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上发表。林、曾的调查距黄仲琴教授的首次调查四十多年，距黄教授的论文发表也有二十多年，这次调查和研究打破了仙字潭岩刻研究长时间的沉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调查报告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仙字潭岩刻的基本内涵，更为难得的是，报告附上了临拓的纹样拓片，这些带有抢救文物性质的资料弥足珍贵，成为今天仙字潭岩刻研究的基础，广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引用。在林、曾之后，弘礼先生在《文物》1963年第6期上发表《福建古代闽族的摩崖文字》一文，拓展了仙字潭岩刻研究的思路。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第三阶段，是近几年兴起的考察，研究仙字潭岩刻的热潮，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其重要标志是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和漳州市文化局1988年7月在漳州召开的以仙字潭岩刻为重点的“漳州地区摩崖石刻学术研讨会”。这几年，众多的专家学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加入了仙字潭岩刻的研究行列，其中，有在岩刻研究方面造诣极深的老教授，也有硕果累累的中年骨干，还有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研究人员。专家们注重实地调查，广征文献资料，从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字学、语言学、美术史等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考证、研究，就仙字

潭岩刻的性质、内容、年代、族属、刻制方法等问题进行探索,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极有见地的新见解。如万里云、刘蕙孙、陈国强、陈兆复、蒋振明,盖山林、蒋炳钊、狄宠德等先生,从而使仙字潭岩刻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取得了新的可喜进展。

综观各家研究成果,仙字潭岩刻研究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性质方面展开充分讨论,内容方面进行勇敢探讨,年代方面意见基本明确,族属方面观点相对集中,方法方面注重实地调查。

仙字潭岩刻的性质问题是专家们讨论最充分的问题,几乎是有文必涉,有涉必争,各路专家见仁见智,畅所欲言,观点鲜明,精彩纷呈,不同观点在这里展开充分讨论,拼撞出学术研究特有的火花。所谓不同的观点,主要是指这些岩刻是“字”还是“画”两大观点,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图画文字”。围绕着是“字”是“画”这个性质问题,一千多年来一直只有“文字说”一家之言,直到1986年初,盖山林先生力排众议,独辟蹊径,发表《福建华安仙字潭石刻新解》一文,对“文字说”提出挑战,明确提出这些岩刻是“岩画”,并对画面进行了“新解”,才打破了传统认识,从而也引燃了“字”“画”争论的导火线。盖文发表后,许多专家就性质问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字说”学者根据岩刻的纹样结构与甲骨、金文的比较、文字产生的前提、条件和要素等方面,认为这些岩刻属于文字的雏型,基本具备文字的功能,因此是字而不是画,至少也是“图画文字”,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这些字的属性,主要有“古篆”、“大篆”、“籀文”或“苗文”、“吴文字”、“吴

籀”、“象形文字”、“图象文字”、“图画文字”等。持“文字说”的代表者有黄仲琴、林钊、曾凡、刘蕙孙、林蔚文、曹锦炎等先生。“图画说”学者根据对岩刻纹样的结构、内涵、历史地理因素的分析，与字画的本质区别，及与广西、江苏、台湾、云南、新疆、内蒙及世界各地有关岩画遗存的对比研究，认为是图画无疑是“经过作者艺术夸张浓缩，符号化了的原始图画”，持此说者的代表有陈兆复、盖山林、蒋振明、蒋炳钊、陈龙、王振镛等先生。目前，“字”“画”之争“干戈”不息，不仅谁也没能说服谁，相反地，分歧还有扩大之势。学术之争，由分歧趋向一致固然是理想的结果，但由一种观点引出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未必不是好事，也许这正是仙字潭岩刻研究以它特有的方式取得进展的一个表现。

仙字潭岩刻的内容是专家们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许多专家倾向于认为，这些岩刻表现了某种功利目的，在这认识基础上，又各自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和探讨，有的还进行全面的解释。关于岩刻的内容，出现了“图腾（或族徽）说”、“舞蹈说”、“事件说”、“宴饮说”、“征战说”、“纪功说”、“媚神、娱神说”、“祭祀说”、“地界说”和“生殖崇拜说”等多种解释，有的还作了具体解释，如媚神、娱神、祈神方面，具体为祈求丰收、平安，祭祀水神，清弭疆患，舞蹈方面有舞人形体动作，舞人排列的寓意等。有些“文字说”论者还尝试着作了破译，刘蕙孙教授对第二、三、四、五段译为“昱（明日），馘夷俘越，□吴玉昱，吴战越、战番、□番”，认为“是吴部落的首长战胜了夷、越、番三种称王纪功的刻石”。在刘教授之后，林蔚文先生译为

“𠂔（部落）二师（征）伐（敌）酋（首）俘伏（敌）酋（首）”，认为是“记载𠂔部落征伐越某一部落（氏族）的一次战斗纪功石刻”。如此丰富的解释和勇敢的破译是过去所未见的，这种现象，如果没有对仙字潭岩刻的深入研究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任何一处古代文化遗迹的研究，研究者们都力图对其年代作出合乎实际的考证，对仙字潭岩刻的研究也不例外。过去，对它的年代问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讨论得不是很充分，有的断代也较笼统。现在，专家们都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考证年代时能努力把握断代的主要依据，又不忽视岩刻本身的细微末节，力争立论有据，所据有理。陈存洗、王振镛先生不拘泥于古文献和岩刻本身的材料，另有所钟，注意从对遗迹附近文物普查所得的地下实物遗存中去寻求答案，对岩刻的年代提出有力的佐证，这样的论证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无现代科学测试手段用于测定岩刻绝对年代的先例，仙字潭又不象他处岩刻那样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及考证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因此对仙字潭岩刻年代的推断出现多种观点是很正常的。现在，对其下限定在唐代以前已无多大异议，因为唐代已有文献记录可证，上限则比较复杂，“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后期”有之，“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金属时代”、“唐以前”、“古文字出现以前”亦有之，具体一点的，有“殷周”、“商周”、“商至西周”、“商至春秋”、“秦汉”等说，更具体的还有“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的浮滨类型文化时期”、“吴太伯、寿梦、阖闾之间”、“早于无诸”、“魏晋南北朝至王审知主闽”等。仔细分析以上各种观点，可以看出多数

意见同意把其相对年代定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至于这个时期的仙字潭地区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已不是争论的主要问题。考古学上对于没有明确纪年的遗迹遗物的断代，往往是定绝对年代的只是相对准确，而定相对年代则是比较准确，从这一点来看，专家们对于仙字潭岩刻所定的相对年代，无疑是增加了断代的准确系数。

族属问题的考证历来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但专家们知难而上，饶有趣味的是，对于族属，大家所见略同，不象其他几个问题意见分歧那么大。关于仙字潭岩刻主人的族属，观点主要集中在“越族”（及其衍生的“越部落”、“福建越族”）、“畬族”（及其衍生的“畬人”、“兰雷族”）、“吴族”等三大族属上，以认“越”、“畬”者居多，对于某些带有很大随意性的主观臆测，有的专家进行了有力辨析，使似是而非的观点得以澄清，从而使族属问题的观点越辩越明，渐趋一致，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仙字潭岩刻研究方法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注重实地调查。专家们跳出经院式学术研究的窠臼，引用文献资料又不因袭文献资料，尊重前人成果又不迷信前人成果，更注重实地调查，以取得第一手的实物资料。本书收录的论文的作者们几乎都到仙字潭实地考察过，因此言之凿凿，达观自信。有的专家不仅注意对仙字潭岩刻本身的调查，同时还注意与之关系密切的地下文物和毗邻地区及九龙江流域岩刻地点的调查，还有的注意到其他省区乃至国外的岩刻资料，这样，让事实自己说话，让“它山之石”作证，根底稳，视野广，文章丰满，宏论连篇，质量明显提高。

毫无疑问，仙字潭岩刻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但这并不等于说研究工作就此止步了。实际上，学术界对不少问题认识不一，有的差距甚大，有的相悖而立，因此，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研究水平完全可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岩刻遗存的专题调查。实物资料是考古研究的基础，岩刻研究的“物”就是岩刻遗存，要开展岩刻问题的深入研究有赖于岩刻遗存的深入调查，而这个调查，首先必须立足于本地，因为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外地资料固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最终解开学术“谜底”的钥匙还是本地的资料。深入调查、研究本地的资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现有的这些资料毕竟有限，它跟岩刻问题所包涵的容量还很不相称。因此，岩刻遗存的专题调查势在必行，考虑到地域文化的特点，这个调查可以九龙江流域为中心，延伸到福建全境及周围有关地区。目前，仅福建境内有古籍可查的记有“仙字”、“仙书”、“仙篆”、“古籀”遗存的就不下十多个县，这些县的岩刻至今未见踪迹，而漳州地区未见诸于古籍记载的一些县反而调查到一些岩刻地点，这说明福建岩刻遗存蕴藏丰富，潜力很大。如果通过调查，不仅使古籍所记的许多岩刻遗存能得以证实，并能发现更多的新地点、新资料，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丰富的资料中进行排队分析，去芜存精，鉴别比较，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到那时，再反过来验证仙字潭岩刻的有关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就会更清楚了。

其次，要取长补短，广开思路。学术问题要有主见和创见，避免主观片面。在仙字潭岩刻的研究队伍中，不乏有主

见、有创见者，但由于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囿于资料的局限，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难免失之偏颇。要提高研究工作的整体水平，就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广开思路。如以仙字潭岩刻的性质而言，这种似字不象字、似画不象画、字画界限一时还难以截然分清的纹样，很可能就是古文字产生前夜的某种过渡形态，它是研究“书画同源”的绝好素材，也为“字”、“画”论者们提供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极好机会，双方都可能从对方学到自己平时学不到的知识。但如果把问题绝对化，自绝思路，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又如年代问题，风格稚拙并不意味着年代古老，年代古老也不全是风格稚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先民们的创造力往往出乎后人的意料之外，这已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许多事实所证明。对待仙字潭岩刻的年代问题，既不能因为纹样古朴就断然定为原始社会，也不能说因为没有金属工具不可能有这样的刻制效果，就轻易地否定它为原始社会的可能性。我们不妨广开思路，仔细倾听不同意见，全面分析各种考古现象，这样所下的结论可能更接近于客观实际。

最后，还要提倡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考古学是一门既“老”又“新”的科学，它的产生，使许多学科受益不浅。借助于其他学科，考古学本身也解决了许多难题。学科之间的互相交叉渗透，相得益彰，是考古学充实自己、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仙字潭岩刻这类课题研究中，多学科的互相渗透和综合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由于考古学与文献资料、神话传说的互相印证，由于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

民俗学、地质学以及美术史等学科的渗透，使我们尝到了一些甜头，如果进一步加强这种“渗透意识”，可望有进一步的收获。以民族学为例，许多学者运用印第安人等民族学资料，说明了不少问题，但这方面的材料还不太多，本地的材料更少。这不由使我们想起汪宁生先生在《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一书及有关论著中对民族学材料的出色运用，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我相信，仙字潭岩刻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有着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前景。

以上意见很不成熟，错讹之处，请专家指教。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有更多的新的成果出现，把仙字潭岩刻的研究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汰 溪 古 文

黄 仲 琴

一、引 言

西南民族于我国古代文化有重要之关系，在今日学术界已成为一个研究之问题。学术机关以及学者个人，多往川滇各处为实地之考察；又如云南罗罗（编者按：罗罗系彝族旧称，解放后废弃不用，姑存原文）及其他古族之文字，亦有为专门之研究者。川滇之外，如粤如湘如闽，尚有古代民族之遗留，若盘、蓝、雷之类是也。兹述往年在闽南所发现之古代遗文一种，以供学者参考。

二、汰 溪

上述古文在福建华安县之汰溪附近。华安原名华峰，前清属龙溪县，设有县丞驻扎。最近改为县治，易今名。汰溪属华峰之桃源保，北距华峰六十余里，东南距龙溪县治四十余里。

华安无志书，《龙溪县志》卷二云：“汰溪在二十五都，西汇大江，达桃源洞。”

《志》言之“大江”，即九龙江，又名北溪，自北而南，纵贯龙溪华安两县全境。桃源洞亦属桃源保，盖保以洞得名也。汰溪之上为石蚵山。《龙溪县志》卷二云：“石蚵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

浸”。《志》说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闻在海中”之语。闻之登其巅者，至今尚蚬壳弥望，既有贝类，可供食品，古代民族聚居其旁，亦理所固有也。

三、古文发现时日及其地之风景

文系摩崖，大字深刻。崖在汰溪北岸，土名“仙字潭”。民国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作者闻汰内乡人言及。其初，言者不能实指其地，旋觅得一知者为导，是夜寄宿于汰溪以南之文浦山（村名，蔡姓聚族而居，始自元季）。越日，黎明，偕导者乘村人常乘狭且长之梭船，船夫四人，二撑竿，二在前后推挽之，自文浦山下驶，啮浅沙，渡飞瀑，越石梁，蛮荒风景如读非洲游记。七里许，至潭滨，潭乃汰溪之一部分，以是处水较深，别名之为潭也。潭水作浓绿色，上临峭壁，多蔓藤萝，间生短竹。山禽翔集，潭北有天然之石阶，巨石蒙苔，作赭黑色，迎人面，错立如屏，文刻其上，即乡人称为仙字者也。

四、刻 字 处

作者留潭边，仅二小时，因归途行舟，甚费晷刻，不能久停，以穷其境。摩崖文字，显然易见者：

右一刻：二行，字大者八寸，小者二寸；下作二合形。此一石刻处，低与山径平（拓片摄影）。（见图版6）

中一刻，较高，陡难攀援，仰望之，似有大中字，横二尺许，旁多刻合形，小者约七八寸，字之大小悬殊，亦无行列。

左一刻：悬崖更陡，遥观，有字七八行，甚整，多作合形，字可六寸而强。